

【婚姻、家庭问题】

透视弱势群体 ——中国离婚妇女的生活状况及其权益保障

马致远¹, 张 蓉²

(1. 长安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54; 2.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 尽管中国目前尚无对离婚母亲提供子女抚养资助费的社会保障政策, 但近九成的单身母亲是子女抚养的主要承担者。大部分离婚妇女的年龄段为 35 岁到 50 岁, 其生活来源主要依靠自己。月实际收入在 500 元以下的占大多数; 六成的离婚妇女认为她们离婚后的生活“极为清苦”和“比较清苦”。半数以上的离婚妇女认为她们目前的生活状况是在“维持生存”。中国 150 万个单亲母亲家庭形态的出现, 意味着一种贫困现象的产生, 将直接影响到离婚妇女的权益保障及中国未来的人口素质, 不能不引起关注。离婚妇女的权益保护中出现的问题, 在深层次上是中国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反映。是社会功能(给予弱势方援助)和执法能力(强制支付抚养费)不强的表现, 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法律法规及社会保障体系。

关键词: 离异女性; 单身母亲; 贫困; 弱势群体; 权益保障

中图分类号: C913. 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3)03-0056-08

Looking into the Weak Group ——Living State and Rights Assurance of Devoiced Women in China

MA Zhi-yuan¹, ZHANG Rong²

(1.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54, China; 2.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Up to now, there has been no any publications on the state of devoiced women and single mothers in China. Nevertheless, based on the social observation and local reports, there exists poverty among devoiced women particularly single mothers who progressively become one of the most weak groups of people. The investigations in the paper support the conclusion.

Key words: devoiced women; single mother; poverty; weak group; rights assurance

据欧共体议会工作报告公布调查结果显示, 在单亲家庭中, 离异单身母亲带子女的占离异家庭总数的 85%; 这种家庭形态的出现, 意味着一种贫困现象的产生。45% 的单亲家庭收入处于家庭收入分布图的最低线, 很多单亲家庭生活贫困线以下^[1]。

中国目前未见有关离婚妇女状况及单亲家庭的全国性报告。仅就社会观察, 离异的母子家庭, 贫困普遍存在。离婚妇女, 尤其是离异的单亲母亲已逐渐形成中国最易被社会忽视的弱势群体之一。

本文所提供的调查数据验证了这一结论。本次调查是在西安城乡进行的。调查中对西安市城乡各阶层人士及离婚妇女发出问卷 500 份, 其中, 知识女性占 19%, 农村妇女占 41.5%, 企业经理占 4%, 政府处级以上干部占 8.2%, 记者占 5.7%, 省、市、区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占 1.8%, 有 37 位不同阶层的离婚妇女接受了个案采访。限于时间和经费, 本次调查的范围有限, 但所调查对象代表性强, 调查结果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可供相关部门参考。

收稿日期: 2003-05-08

基金项目: 陕西婚姻家庭研究会及香港乐施会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马致远(1956-), 女, 天津市人, 长安大学副教授。

一、城乡离婚妇女的基本现状

当今社会处在转型期,人们对离婚现象已不再陌生了。对个人而言,离婚是对个人生活的重新选择;对社会而言,离婚率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用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指标之一。

(一)离婚率呈上升趋势

民政部“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6]显示,1999年中国有120.2万对夫妻离婚,每千人口中有0.96个婚姻解体,离婚率在20年中约增长了3倍。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6~2000年)》终期监测评估报告^[6],中国人的离婚率自1997年起连续4年均均为1.9%,2000年的离婚人数比1995年增加16万对,这表明,全国的离婚率在4年中连续基本持平。有社会学专家预测,进入2000年之后,中国的离婚率将以每年200万对的速度递增。虽然离婚率不断攀升,但人们对离婚的心理反应已从茫然痛苦的悲感发展到理性的平和。当今的离婚当事人的离婚行为,较之以前的离婚者显得从容多了。从纵向看,中国离婚率上升较快,但从世界范围看,与美国初婚的离婚率50%~67%,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离婚率40%,及世界若干离婚率已超过50%的地区相比^[1],中国尚属低离婚率的国家之一。据联合国1999年《人口统计年鉴》对22个国家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离婚率处在第55位。中国仍是婚姻家庭关系比较稳定的国家。

中国近年离婚率攀升的主要因素有:(1)家庭中两性经济状况的变化,婚姻中的物质财富是影响婚姻状况的客观性、关键性因素。(2)配偶选择与再选择的时空机率的变化。人的自由流动加剧了婚姻的流动性,婚姻重组的可能性增多。直接影响婚姻的质量和离婚率。(3)人们对婚姻观的改变。两性对婚姻的态度,是对财富、婚姻愉悦性、传统道德的看法的总和,是影响婚姻的主观性因素。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以上三大因素的急剧性变化导致了近年来离婚率不断攀升的态势。

(二)婚外情仍是离婚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离婚呈上升趋势的原因很多,既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法律及精神生活的进步与成就,又反映出社会转型期的困难和矛盾以及世界习惯潮流的影响。据上海市调查,因婚外恋导致的离婚已占离婚案件的40%~50%^[2]。在本次问卷调查中,配偶有外遇是妇女离异的主要原因,占

46.9%。

(三)家庭暴力导致离异的比率上升

1995年国务院《中国妇女的状况》白皮书公布:全国2.67亿个家庭,离婚率为1.54%,约40万个,其中1/4起因于家庭暴力。据全国妇联1997年对15省市信访案件的统计,因家庭暴力引起上访的案件占婚姻家庭问题信访总数的34.55%。全国妇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11],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30%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其中施暴者9成是男性。中国每年有10万个家庭因暴力而解体。

本次调查显示,因家庭暴力而离婚者占被调查妇女的30.8%,已跃居为仅次于婚外情的第二大离异原因。有6%的妇女离婚后仍遭受前夫的骚扰和殴打。

(四)更多的妇女是离婚的主动提出者

本次调查表明,有54.2%的妇女是离婚的主动提出者。对于这些主动提出离婚者,更多的是出于对婚外恋、家庭暴力、欺诈、歧视、虐待、赌博、酗酒和不公的反抗和逃避。而44.9%的被动离婚者,大部分是丈夫有外遇被迫离婚。被动离婚者的经济、身心状况比主动离异者更差。有67%的被访者认为目前离婚率增高是妇女背离传统观念的束缚,追求幸福的婚姻和充实的精神生活的体现,有92.6%的女性和90%的男性认为离婚率的增高是“社会的进步”。女性成为离婚的主动方,一方面说明现代妇女对婚姻品质的期望值远远高于上一辈人,一旦婚后的现实与婚前的期望产生矛盾且不可调和,离婚就是妇女必然的选择。另一方面显示女性在不幸婚姻中更多地处于负重者、受害者和付出者的地位,所受身心伤害更甚。离婚是迫于无奈的下策选择。本次调查显示,后者的比例高达77.6%。

(五)中年是妇女离婚的主要年龄段

本次调查显示,离婚妇女年龄在35岁到50岁的占58.5%,居离婚妇女年龄榜首,说明离婚的最大年龄段是中年妇女。这一年龄段的妇女上有老,下有小,是女性人生旅途中最艰难的时刻。近年来中年妇女离婚率的增加,意味着中年妇女开始珍惜自己的生活质量,要为自己而活的愿望强烈。也说明中年是夫妻的多事之秋,是婚姻的危险年龄段。中年人的离婚原因有以下几种:(1)双方性格差异较大,思想观念不同,夫妻生活平淡无味。(2)夫妻性生活不和谐。(3)一方对家庭无责任感,不尽做妻

子、做丈夫、做父母的义务。(4)家庭暴力。(5)一方有第三者或双方均有第三者。(6)一方在国外,长期分居,感情无法沟通。(7)婆媳矛盾、家庭矛盾。(8)一方或双方下岗,为生活所迫。其中,第三者插足、家庭暴力是该年龄段人离婚的主要原因。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便民法庭一年来审结的1580件离婚案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占30%,35岁到50岁的占50%,50岁以上的占20%。这一数字与本次调查结果基本相符。

(六)母亲是离婚后子女抚养的主要承担者

尽管中国目前并无对离婚母亲提供子女抚养费资助费的社会保障政策,但母亲仍然是夫妻离婚后抚养子女责任的主要承担者。许多妇女在离婚时,也曾考虑过放弃抚养权,以便经济上宽松些,再婚时少一些阻力。但母爱的天性使她们宁愿放弃自己的幸福,也要争取孩子的监护权。调查表明,无论主动离婚者还是被动离婚者,在离婚时有88.5%的受访离婚妇女实施抚养孩子的义务,其中14.6%的有稳定收入的受访妇女认为与赌博、酗酒、打人、不顾家庭的丈夫离了婚,生活虽艰难但比以往更安定,生活状况更好;而71%的受访者认为离婚后经济状况下降很多,健康状况不好,经常头昏失眠,生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是为了孩子。

二、离异妇女的生存状况

离婚妇女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的困境,生存的压力,繁重的家务,育儿的艰苦,性别歧视和女性就业上的劣势。生活质量与婚前比大大下降,单身母亲由于要兼顾家庭和事业,又没有相应的帮助,身体状况一般较差。“离婚抑郁症”是离异妇女的常见病,特别是中年女性被动离婚者,更感到前途渺茫,命运莫测。传统的贞操观仍严重地妨碍离婚妇女的再婚,加之目前婚姻市场上大龄待婚女性与大龄待婚男性比例失调,即女多男少。教育层次上失衡,既男高女低,这使离婚妇女,特别是带着孩子的母亲,很难找到合适的再婚对象,这就意味着,离婚的中年甚至年轻母亲,可能要从“守寡”下去,除沉重的经济负担外,生理、心理或感情上将长期不适或导致身心疾病。

(一)城乡妇女的就业及劳动权益现状

国企职工专项调查数据表明^[3],国企下岗女工普遍感到再就业困难,她们中有49.7%的人认为自己再就业时受到年龄和性别歧视,许多用人单位在

招聘下岗女职工时订立苛刻的条件,拒不招收有一定技术经验的下岗女职工;一些以简单劳动为主的单位也不愿意录用中年下岗女职工。统计数据还表明,85%以上的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中国妇女比中国男人多干2.7个小时的家务。而女人们的收入只为男人们的7成,且这种收入差距仍然在不断扩大。

上述表明,目前中国男女就业和收入比例女性明显劣于男性,在本次调查中,61%的男性支持这一观点。有89.9%的女性和70%的男性认为在非公有企业中,女性就业及从事较高收入工作的机会比男性少得多。88.9%的女性和80%的男性认为女性在个人发展上受到来自自身及社会的传统观念的限制。传统的性别歧视不仅影响着社会对女性的评判,扩大了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还加剧了女性在竞争中的不利状况,这种状况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目前中国城乡妇女的就业及经济现状尚且如此,作为弱势的群体,那些承担抚养子女重任的离婚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及生活状况就不难想象了。

(二)离异妇女的经济状况

在被调查的离婚妇女中,单亲母亲家庭占总数的88.5%,这种家庭形态的出现,意味着一种贫困现象的产生。单亲家庭的收入大大少于双亲家庭,由于女性收入普遍偏低,生活质量大幅下降。《婚姻法》规定:离婚后,一方只需向抚养孩子一方提供基本工资的20%~30%的抚养费。而目前,基本工资只占总收入的一小部分。只有一部分单亲母子家庭能按时得到这笔有限的抚养费。根据调查走访资料,有61.3%的抚养一个孩子以上的离婚妇女目前的生活来源主要靠自己;生活来源主要靠配偶的仅占6.7%;而一部分靠自己,一部分靠配偶的占30%。月实际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占25.4%;月实际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56.2%;无住房的离婚妇女占56%;60%的离婚妇女认为她们离婚后的生活“极为清苦”和“比较清苦”。67.1%的离婚妇女生活负担“重很多”;有71%的离婚妇女认为离婚后的生活状况比离婚前“下降了”。56.2%的离婚妇女认为她们目前的生活状况是在“维持生存”;有89%的各阶层被调查者认为离婚的单身母亲“处境困难”,其生活状况“下降许多”;有33.8%的前夫完全不给生活费;有29.2%的前夫不能按时按量付给生活费;90%的男性受访者和92.6%的女性受访者认为离

婚妇女的生活水准“普遍下降”;有22.2%的离婚妇女认为她们的生活处于社会最底层。这一调查结果与北京离婚妇女生存状况的调查结果相符。

北京市妇联的一项调查表明^[8],城市单身母亲一般是中年妇女,职业多为工人,工资收入较低,月收入300元以下的将近半数,子女年龄多在7~18岁之间。男方给付子女抚养费的情况较差,约有一半不能给付或者不能按时给付。带一个孩子的离婚妇女,有四成以上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北京市总工会女工部1998年一项调查显示^[10],下岗单身母亲的人均收入只有212.58元,其中低于200元的占62.5%。最低的只有55元。她们是城市中收入最少的人群之一。

根据青岛市妇联的一项调查^[6],在全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5.4万余人中,贫困单身母亲2万人左右,在享受低保的近3万户家庭中,贫困母亲家庭2万户左右,占2/3。根据陕西省妇女家庭婚姻研究会家庭暴力专线统计,有3~4成的受虐妇女不离婚的原因是离婚后母子没有经济保障。陕西省汉中市一个正在服刑的女犯人和女儿一起砍死自己的丈夫,她向我们哭诉:“他(指丈夫)天天痛打我们,与其让他砍死我们母女,或我们离开他挨饿,不如我们砍死他,到监狱去讨口饭吃”。陕北农村女子刘某嫁到西安后,经常挨打,或被撵出家门长达半年之久。她为离婚上法庭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陕西渭南市河阳乡妇女王某每月300元打工收入无力养活两个孩子,忍痛将孩子送人。

据欧共体议会工作报告公布的198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1],在单身家庭中,单身母亲带着孩子的占总数的85%;45%的单亲家庭收入处于家庭收入分布图的最低线,还有很多单亲家庭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日本劳动研究机构2002年2月进行的调查显示,在母子单独生活之前,“由于结婚、生育等辞职”而失去职业的比率为38%,而离婚后工作的比率为87%。年收入不满200万日元的占44%,因为没有一定的资格或技能,所以工作收入都比较低。

加拿大因家庭破裂导致妇女及其幼儿陷入贫穷^[5]。单亲家庭依然处于困境之中,单身母亲仍面对贫穷及其他压力,严重程度十分惊人。在1997年就有34万抚养幼儿的单身母亲被列入穷人之中,其家庭占单亲家庭的57.1%。

(三)离异妇女贫困的原因

作为离异妇女这个弱势、贫困的群体,除了单亲

家庭的收入大大少于双亲家庭外,离婚后的生活质量下降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妇女就业率及实际收入偏低

调查结果显示,有40.7%的离婚妇女认为她们贫困的原因是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妇女就业率及实际收入偏低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转型期妇女地位的下降及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二是部分妇女自身素质不高,就业竞争力不强。近年来下岗女工及农村打工族离婚比例增大,许多人生存和再就业困难,又承担着抚养子女的重担,致使经济状况愈加恶化,使这部分妇女儿童相对贫困程度加重。

2. 离婚抚养费偏低

《婚姻法》规定,离婚后,一方只须向抚养孩子的一方支付基本工资的20%~30%的抚养费。而目前,基本工资只占工人收入的一小部分。更为糟糕的是只有一部分单亲家庭能按时得到抚养费。调查资料显示,有42.2%的受访者认为生活水准下降的原因是“孩子父亲不给生活费或生活费太少”;有56%的社会各阶层人士也认为其原因主要是“孩子的父亲不能承担相应的责任”。35.4%的离婚妇女认为政府应强制孩子父亲交纳抚养费。

3. 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在发达国家,单亲家庭的贫困问题已出现多年,政府有相应的举措和专门针对单亲家庭的社会援助系统。在中国,单亲家庭问题刚刚引起关注,政府有对贫困户的救助行动,还没有对单亲家庭的专项扶助。现有的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对“弱势群体”的扶助不够。

执法人员的法制观念不强,平等意识不强,执法能力(如强制支付抚养费)不强也是造成离婚妇女贫困的直接原因。对于因不堪忍受男方的暴虐而到民政司法机关请求离婚的妇女常得到的回答是“离什么离?打你两下有什么了不起的?”离婚后仍受到前夫的骚扰和暴力侵害的妇女向公安司法人员求助时被认为是“了不断的家务事”而置之不理。对于已经很低的抚养费的交纳,司法部门都难以执行。

在问卷调查中,认为“法院在判离时未能给无过错方在财产分割上实质性倾斜。”及“有关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的占89%;认为“政府及有关部门未能给予相应扶助”的占56%。100%的男女受访者认为“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对低收入及无经济来源的离婚妇女给予相应扶助或就业培训。

4. 离异女性法律意识不强

目前,中国对妇女权益的保障问题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法律体系。许多妇女不知法、不懂法,不能利用有利的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有的甚至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对于侵犯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往往长期忍气吞声,把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使得妇女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在离婚中,男女双方自愿达成解除婚约协议的比例日渐增多,但在财产分割方面,由于女方柔弱忍让的天性以及缺乏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导致某些损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行为被合法形式掩盖下来。有73%的离婚妇女承认她们在离婚时不懂或只略知婚姻法及妇女权益保护法,分别有25%和39%的妇女为了“面子”或出于“能离就行”的心理,离婚时在经济上无任何条件和要求,以致于离婚后的生活苦不堪言。

有49%的被访者认为“妇女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不能利用有利的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有的甚至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是妇女离婚后境遇不佳的根本原因。

5. 育儿费、医药费过高,抚育孩子的负担过重

面对不断攀升的教育费、医药费,对19.2%的离婚妇女来说,独立抚养孩子的感觉是“不堪重负”;49.9%的妇女感觉“有相当难度”;有30.8%的妇女“没有能力”负担孩子的教育费;44.6%和21.5%的妇女认为独立抚养孩子对自己的事业有“相当影响”及“严重影响”。

(四)离异妇女的身心状况

离婚妇女的经济状况直接影响到身心状况,并影响到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在37位被访者中,有一人喝农药自杀,有2人自杀未遂,6人曾有自杀的念头,14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患,23人有睡眠障碍。被调查者中,有32%的人认为自己“活下去的主要动力是为了孩子”;有78%的离婚妇女经常失眠;有26.2%的离婚妇女有“支撑不下去的感觉,想轻生。”有32.7%的离婚妇女的身体状况“不好”或“很不好”。一般中下层妇女以生存压力为主;而收入稳定,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女性和职业女性以精神压力为主。生存压力的主要原因是贫困、无助。精神压力的来源是社会的歧视和偏见。无论面临生存压力或精神压力,如果调整不当,离异妇女将或多或少地患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疾病,甚至轻生。

陕西临潼农村离婚妇女张某过年不敢带孩子回家,怕村人耻笑,大年初一自杀未遂;高校女教师许某因丈夫有外遇离婚,却被同事、邻居视为没有“女人味”的怪物,三次有轻生的念头;女工赵某因丈夫有外遇离婚,离婚后无房住,借住亲属处又遭白眼,多次对朋友说:活着没意思,离异4年后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某刊物主编孙某才华横溢,离婚23年中,有5次轻生念头。

瑞典大约20%有子女的家庭是由单身母亲一人来支撑的^[5]。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国家保健和福利局的研究小组对该中心于1991~1995年间收集到的90111名单身母亲以及622368名有配偶的妇女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研究^[5]。研究报告称,单身母亲与有配偶的母亲相比,过早去世的几率高出近70%。此外,单身母亲中由于自杀或与酗酒有关的原因而过早去世的比例非常高。研究人员发现,总体而言,单身母亲较之同龄有配偶的母亲得病的几率高67%。研究数据显示,单身母亲自杀比率是有配偶的母亲的2倍;死于外部暴力、人身攻击或谋杀的比率是有配偶的母亲的3倍;而死于与酗酒相关的病因的比率是有配偶的母亲的2.37倍。

在本次调查中,有89%的离婚妇女希望周围的人群及社会对她们更宽容一些,政府职能部门能关注她们;有78%的离婚妇女希望媒体和司法界更多地关注理解扶助她们。由此可见,离婚妇女身心状况不好除单亲家庭本身生活的艰辛外,社会人群中的不宽容成分、社会的歧视和偏见及社会功能的不完备、执法不力是主要的因素。

(五)离异妇女的居住状况

有独立住房的单身母亲家庭只占受访者的24%,69.9%的离婚妇女住在娘家或临时租房。陕西渭南农村妇女王某带两个孩子而无栖身之地,只好把孩子放在父母家,自己外出打工供孩子上学。城市妇女离婚时也难以得到应有的共同财产份额;单位分房、买房以男方为主,造成离婚妇女住房困难;调查中,有26%的城市离婚妇女无住房,其中33%的人临时租房;52%的人住父母及亲属家。

(六)贫困单亲家庭对孩子的影响

现阶段,中国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事业不发达,遭受父母离异之苦的儿童在经济和精神上必然出现“受剥夺”状态,即享受不到与完整家庭子女同等待遇的生活。夫妻离异后,幼龄子女一般由母亲抚养,这种“孤儿寡母”的家庭若无外援,经济上的不利处

境是可想而知的。66.2%的离婚妇女认为缺少父爱对孩子的身心成长影响较大;有30.8%的离婚妇女“无力担负孩子的教育费用。”

目前中国约有150万个单亲家庭,其中绝大部分是母子家庭。离婚妇女的生存状况直接影响了一代的身心健康、受教育程度。随着中国离婚率持续上升的趋势,面临困境的单亲子女的比例越来越多,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的人口素质和人类发展。

三、离婚妇女的权益保护

离婚妇女权益保护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深层次上探究是中国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的反映;是社会功能(给予弱势方援助)和执法能力(强制支付抚养费)不强的表现,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执法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一)关于对“平等”与“差异”,“公平”与“效益”的再认识

在舆论界与司法界,不少人存在这样的认识,现在是市场经济,要效益就不会有公平,要平等就不要谈差异。既然倡导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男女应享有同样平等的权利,在法律条文中向女性的保护和倾斜有悖于平等原则^[7]。事实上,1949年以来所推行的“男女平等”,是建立在行政干预机制上的形式上的平等,国家以行政力量规定着女性在各个方面与男性的一致。市场经济结束了照顾女性的平等,与之相伴的必然是妇女实际地位的下降——中国妇女的地位从政治上、经济上的下降。笔者以为,真正的男女平等,是在承认男女两性生理差异情况下的平等,是在容纳差异的基础上争取结果平等的终极目标。如果以形式上的平等抹杀了男女两性生理差异,就会扭曲了女性特殊的生命活动方式,就会否定对目前仍被视为弱势群体的妇女,尤其是离异带子女的单亲妇女的保护和救济。对于公平和效益的关系,仅从理论上理解也容易曲解。要效益就不会有公平的理论貌似有理,但对于在男尊女卑传统观念下长期处于的弱势一方的中国妇女,怎样让她们在较少的资源量、相对劣势的生理特点的背景下、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与男性讲平等、争效益、拼素质?尤其是那些在艰苦环境下肩负养育后代的单身母亲?

(二)世界各国对离婚妇女的权益保护

在中国,单亲母亲家庭问题已引起社会关注,政府已实施对贫困户的救助行动,但还没有对单亲母亲家庭的专项扶助。而在国外,对于单亲家庭的贫

困问题,政府有相应的举措和针对单亲家庭的社会援助系统。这些措施包括:

1. 发放福利津贴

政府发给单亲父母亲特别津贴,支付一定的子女养育费,以保证儿童的基本生活需要,设有减少单亲家庭上税的优惠政策。在有些国家这种救济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日本仅2000年就有26.4万对夫妻分道扬镳。由于许多妇女都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对她们来说,向孩子的父亲要钱“很危险”,即便当时男人同意给钱,事后也很快就会反悔。因此政府救济是她们抚育孩子的主要资金来源。凡年收入不足1万美元的单身母亲,都可以得到每月最高为341美元的救济金资助^[8]。

美国政府每年花数千万美元资助单亲家庭抚养儿童。政府给每个单亲家庭不满5岁以下的儿童每月400美元的资助费,母亲也可获得300美元的食品补贴,同时母亲和孩子均可享受医疗保险^[9]。

德国大城市的离婚率也在50%左右。除前夫应支付的赡养费外,政府每月支付单身母亲每个孩子600马克以上,直至母亲再嫁^[5]。

2. 提供就业机会

政府开办针对单身母亲的职业培训,单身母亲在欧共体成员国的就业率从原来小于25%到高于75%。美国、日本等国家较早地实行了对单身母亲的免费培训政策。

3. 减少房租

欧美很多国家有专门的免租或低租的房屋为单身母亲提供,作为对单亲家庭救济的一部分。

4. 前夫支付生活费

在欧美国家,妇女离婚后,前夫需支付半数的家庭财产做为妇女离婚后的抚养费,贫困妇女再婚后前夫仍继续支付抚养费。这个法律制定的原则在于将家务劳动计算报酬,并计算妇女为家庭减少了个人收入和放弃了发展的机会。在中国法学会1999年婚姻家庭学会关于婚姻法修改的研讨会上,有很多专家赞成这一理念。他们认为如果一方为了家庭和对方奉献了一生,老了以后却被扫地出门,生活没有保障,显然有违公平原则。

5. 提供医疗保险

德国、美国及欧共体国家和其他国家对单身母亲都提供了医疗保险。这一政策也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采用。

(三)对现行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进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已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包括妇女在内的城镇居民在生活困难时都可以得到政府的救助,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水平。1999年9月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使城市居民在享受救济和帮助的权利方面有了法律上的保障。农村妇女在生活困难时也能从当地政府得到社会救济。目前中国已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现行法律法规在全球范围比较之下,在结婚自由、离婚自由、夫妻间财产所有权的规定、男女平等地位、婚姻解体后财产分配、离婚后子女抚养等方面均属相对开明的法律。

尽管离异妇女在法律文本中获得了“权利”,但是由于权利之间的互相冲突,权利的笼统性、非确定性和难以操作性,离异妇女的权利仍在一定程度上在“社会效益”的借口下被忽略,被排斥,致使很多离异妇女及其子女的生活状况下降,相当一部分离异妇女的生活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从人文关怀、人道主义、社会福利保证的角度上讲,西方发达国家现行法律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尤其是对离异妇女的权利保障方面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

近20年来,中国离婚率由3%提高到13%,离婚率的上升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体现。然而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及法律法规还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在现阶段我国的综合实力还不足以对单亲母亲提供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离婚妇女的权益保障将作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一个国家的两性平等发展水平及对弱势群体的扶助程度是其经济发展的指标之一。况且,城乡离婚妇女的权益的保护不仅事关离婚妇女本身,还关乎中国的人口素质和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在两性平等方面加快与国际接轨,要提到有关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来,将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制订的更加完善。为此,建议有关部门:

1. 对无工作保障的单身母亲给予社会救济

考虑到一部分离异单身母亲的困境,建议在全国慈善总会捐助款项中拨出专款设立贫困母亲救助专项基金。专款专用,并采取各种形式开拓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捐助渠道。建议国家在经济实力许可的情况下,逐步实行对无工作保障的单身母亲的社会救济。

2. 为单身母亲及其子女立法

一个单身母亲带着一个未成年子女工作,困难之大,是一般健全家庭成员难以想象的。这是一个非常“弱势”的群体,但还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更未给予必要的道义上的关照。把她们当作健全家庭职工一样看待,是不公平的。无论从保护妇女还是从保护儿童出发,都应建章立法,像保护残疾人一样地保护单身母亲。为此建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总、全国妇联等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单身母亲保护法》,作好这项“温暖工程”,充分体现出党和政府对单身母亲的关怀。立法内容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1)各企事业单位不得以机构改革或减员增效为名,强迫单身母亲下岗;

(2)单身母亲实行7小时工作制。允许晚来半小时,早走半小时,以利照顾子女。不安排节假日值班,不值夜班。每季给2~3周带薪年假,不影响出勤奖,并允许积累使用(当年内)。

(3)单身母亲收入过低者,给予长期补助(补助金额各地酌定)。单位和工会福利分配,也要向单身母亲倾斜。

(4)幼儿园、托儿所放寒暑假,要为单身母亲的孩子继续服务。

(5)对单身母亲的工作分配,要充分考虑其照顾未成年子女的困难和需要。

(6)医院、学校和公交(月票)等,对单身母亲及其子女,在收费上都应有优惠办法。

3. 细化、增补婚姻法相关的解释条款

(1)离婚中不养育子女一方应提供每月收入(而不是基本工资)的30%~40%做为孩子的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

(2)鉴于中国国情,可考虑对已考入大学的子女支付抚养费的年龄延长至大学毕业。以使单亲家庭子女有接受高等教育的经济保证。

(3)对不履行离婚协议或离婚判决中规定支付抚养费的一方,应制订有效的强制支付或处罚条款。

4. 为单亲母亲提供免费职业培训

政府有关部门可考虑为单身母亲提供免费职业培训的计划,以使她们能自谋出路或获得能从事更高收入工作的机会。

四、结 语

中国加入WTO以后,市场化竞争更加剧烈,离异妇女的生存保障问题将更加凸显。与此同时,社

会、经济、法律、人权、环境等各个领域的改革步伐将会大大加快。这是一个促进两性平等、为妇女争取保障权益的大好时机。此项调研从人文关怀出发,希望借助法律、媒体、政府各方力量,关注、理解、扶助、保护单亲母亲这一弱势贫困群体,进而加快在妇女维权方面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推进两性平等发展的进程。

参考文献:

- [1] 民政部财务和机关事务司. 2000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 [2] 民政部财务和机关事务司. 1999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 [3] 民政部财务和机关事务司. 1998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 [4] 民政部财务和机关事务司. 1997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 [5] 2000年世界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 [6]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N]. 民政部中国妇女报,2000-09-06.
- [7] 戴雪红. 失去目标的女权主义运动——平等与差异的两难困境初探[J]. 妇女研究论丛,2002,(5).
- [8] 陈一筠. 现代婚姻与性科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 [9] 陈小江. 女人的出路[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 [10] 刘家殷. 中国离婚问题回归分析[J]. 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学报,2000,15(4).
- [11] 徐安琪. 中国离婚率地区性差异分析[J]. 人口研究,2002,26(4).

[责任编辑:陈志和]

(上接第47页)

今后藏政亦一如既往,随时给以帮助,……不受盗匪抢掠……”^[4]。由此,中印驿运线终于得以重开。此后,中印驿运线在抗日战争中基本处于开通状态。虽然1943年英国宣布所有途径西藏运往中国内地的货物均要事先向英印政府申请出口许可证,拒绝批准一切有关申请,致使这条运输线又中断较为短暂的时间,但是此后西藏噶厦再未封锁这条驿运线,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结束。

1944年沈宗濂入藏时,受英印外交部部长卡罗的邀请进行会谈,期间曾谈到中印运输问题,卡罗表示英国“对于印华驿运以往曾尽力协助”,并且通报了由印度至拉萨的每月运输量均为200~400t,由拉萨至内地每年不过1500t,每月经仅百余吨。沈对此解释到“因受天时及牛马数量之限制无法大量增加”,沈同时向卡罗表示了在印的待运物资,花纱布管制局存有面纱约2000t,交通部的兵工器材也有相当数量待运,复兴公司的生丝布纱也每月有50t。

在整个抗战时期,只有少数西藏商人与英印商人利用这条驿运线将少量民运物资运到中国内地,而中国政府的待运物资则很少能利用这条运输路

线。1941年在日军侵缅前,在印度大约有120000t的军用物资欲通过驿运线运往中国内地,但由于中印驿运线时开时停,实际运入量极小。1943年早期大约只有5000头骡子,1944年至1945年上半年大约也只有8000头骡子与20000头牦牛在这条驿运线上进行运输。据估计,由于英国、西藏噶厦对中印公路日玛线和驿运线的阻挠,中国在二战中将近损失80%的军事物资援助,使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遭到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 [1] 龚学遂. 中国战时交通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 [2] 唐纵. 在蒋介石身边的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M].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
- [3] 姚松龄.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M].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 [4] 多才杰旦.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Z].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 [5]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Z]. 北京:三联书店,1963.

[责任编辑:杨彬智]